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张文宏 雷开春

提要: 本文运用 2007 年上海城市新移民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从社会融合程度来考察,城市新移民的总体水平偏低;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体现出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依次降低的趋势。相对较高的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反映了作为新移民聚居地的上海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状况,则反映出“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宽容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带来的社会融合障碍。因此,要实现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高度融合,需要新移民、本地居民和政府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 社会融合 城市新移民 社会结构

一、研究背景

社会融合 (social inclusion) 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 (任远、邬民乐, 2006)。早在 1890 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的工作和生活适应进行了研究。关于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西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按其基本取向,可以归纳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 (麦格, 2007)。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包括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特纳的边疆熔炉论”、肯尼迪的“三重熔炉论”,以及斯图尔特的“变形炉论”等。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

^{*} 本文为第一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05BSH05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本项目受到国家重点学科(社会学)和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市社会研究 Y0104)的资助,特此致谢。

文化的认同,对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的抛弃。例如戈登提出应该从7个方面来测量族群的社会融合程度: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价值和权力冲突(Cordon, 1964)。罗伯特·帕克则将族群融合与同化视为“群体和个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即个人与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渐融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Park, 1974: 113—122)。然而,正如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所说,“个人与族群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与“同化论”不同的是,社会融合的“多元论”则“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李明欢,2000)。例如,霍斯和金通过对美国“韩裔族群”的研究提出了“非零和型同化”的概念。他们指出,尤其对诸如医生这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而言,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一定与社会型同化一致。虽然韩裔移民在文化上适应了美国社会,但他们不可能在社会方面同化于美国社会结构的所有重要方面,霍斯和金将韩裔移民在适应美国的同时还保留自己文化内核的适应形态称为“执着性适应”(Huh & Kim, 1984)。周敏和林闽钢(2004)通过对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的研究发现,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新移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华人移民仍不愿意放弃聚居的习惯。显而易见,由于现有社会融合理论大多是以解决美国这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为目标而提出的(李明欢,2000),因此,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试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融合问题简单地化约为“文化融合问题”。出于对“移民在迁入目的国后的经济地位获得情况”的关注,经济学家们则更为关注移民的经济融合对其迁移以后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赵延东、王奋宇,2002)。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移民社会融合的观点,“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相互适应。为了完成这一适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尽早促进移徙者在居留的目的地国融入当地社会,符合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最大利益。融入社会的基石是平等待遇和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融入社会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有能力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准入劳工市场和就业、熟悉风俗习惯、接受东道国的社会价值、有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或团聚和有可能入籍”(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06)。

国内学者的多数研究则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外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

过程。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经验发现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田凯(1995)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他认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第二,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的生活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的生活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第三,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新移民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的生活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马西恒(2001)通过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质性研究,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他提出了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可能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朱力(2002)认为,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融合与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风笑天(2004)通过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研究,提出社会融合应该从家庭经济、日常生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生产劳动、社区认同等5个维度来分析。张继焦(2004)则从就业与创业中迁移者的城市适应角度,提出社会融合应当从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济生活、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来分析。杨黎源(2006)以宁波市十几个城镇的实证调查资料为基础,提出从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居选择及安全感等8个方面来分析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从以上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与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不同的是,学者们对国内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淡化了文化的功能,而突出了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的作用。

在移民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无论对于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了嵌入于移民网络的关系资源对移民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王春光,1999;赵延东、王奋宇,2002;赵定东、许洪波,

2004),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带来的交往限制,会强化劳动力移民(即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阻碍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朱力,2002;吕青,2005),因此,相对于劳动力移民进城前的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中作用更大(赵延东、王奋宇,2002)。其次,伴随户籍制度而来的社会排斥是阻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主要阻碍因素。一方面,这种社会排斥来自户籍制度,它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李强,2002),这势必会增加农民工在身份和职业等方面与移入地社会实现融合的困难;另一方面,外来移民还会受到城市居民文化上的排斥,因此他们可能在心理上有意识地保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从而逐渐远离主流社会(李强,1995)。其他学者强调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关键是制度障碍和经济障碍(丁宪浩,2006;张国胜,2007)。此外,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王芮、梁晓,2003)。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将社会融合的过程、状况、影响因素及构成要素等混淆,对社会融合的结构进行规范的量化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在影响新移民社会融合因素的分析上,质性思考多于定量分析;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自愿或非自愿的国际移民,主要是中下层新移民,国内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外来农民工,基本上忽视了处于社会中间层的白领新移民。

社会融合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学关怀而提出的,无论是对那些远走异国的国际移民来说,还是对我国特有的社会底层劳动力流动大军和有制度保障的政策移民而言,相对于本地居民,他们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然而面对陌生的新环境,都面临着同样重要的社会融合问题。但是,国内外已有的移民研究比较关注移民迁移行为发生的社会原因、产生的社会后果及其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较少对移民迁移后的融合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白领新移民为主,以期客观地呈现城市中上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实际状况。本文试图运用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的调查数据,探索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内在结构,描述其社会融合现状,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结构测量指标

正如安德鲁·米切尔和理查德·施林顿所说,“社会融合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它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Mitchell & Shillington, 2002)。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融合结构维度的观点,我们试图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来界定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在选取指标时,既考虑了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思路,也考虑了国内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维度,还考虑了新移民面临的特殊社会问题。其中,“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的程度”、“职业稳定程度”、“亲属相伴人数”、“本地户籍状况”等指标主要借鉴了国际移民研究中的相关维度;“本地人身份认同程度”、“社会交往范围”、“社会心理距离”、“日常交往人数”、“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住房满意度”等指标则是对国内移民社会融合研究相关指标的进一步细化;“添置房产意愿”则是考虑到我国大城市住房价格持续高涨的现实状况而设计的一个新指标。“亲属相伴人数”、“职业稳定程度”、“本地户籍情况”和“日常交往人数”为客观指标,其他则为主观评估指标。具体指标的操作化测量如下: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指学习和掌握移入地方言的程度,操作化为“您能讲上海话吗?”分为“不能讲”、“能讲一些”和“能讲”3种不同的程度,分别赋值为1、2、3。

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操作化为“您是否熟悉本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分为“几乎不熟悉”、“熟悉一些”、“大部分熟悉”和“很熟悉”4种程度,分别赋值为1至4。

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的程度:指“在日常生活中,您会按本地风俗习惯办事吗?”分为“不知道”、“从不遵守”、“仅仅与本地人交往时才遵守”和“完全遵守”4种程度,分别赋值为1至4。

职业稳定程度:根据本次调查中城市新移民职业流动的实际情况,将其职业稳定程度分为3种,其中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其职业稳定程度最高,赋值为3;其次为自雇者,赋值为2;再次是在体制外单位工作的人,其职业稳定程度最低,赋值为1。

亲属相伴人数:指调查进行时所有生活在本地的亲属的总人数,包

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

本地户籍状况:分为“在迁入地未办理任何居住证件”、“暂住证”、“居住证”和“本地户口(包括本市非农业户口和本市农业户口)”4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至4。

身份认同程度:指认同为本地人身份的程度,操作化为“您认为自己属于:(1)外地人;(2)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3)新上海人;(4)上海人”4种类别,分别赋值为1至4。社会流动本身就是人们努力实现身份认同转换的外在表现。考虑到部分选择“不清楚”的城市新移民大多处在身份认同的转换期,我们认为,在逻辑上,“不清楚”选项更接近于“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的回答,故将此选项赋值为2。

社会交往范围:操作化为“您觉得您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范围属于:“不广泛”、“一般”、“广泛”和“很广泛”4种类别,分别赋值为1至4。

社会心理距离:根据博格达斯(Bogardus, 1925)的社会距离量表,从“很不愿意”到“不愿意”、“无所谓”、“愿意”和“非常愿意”与本地人交往,对其分别赋值1至5分。考虑到当城市新移民回答“不知道”时,反映出其对某项与本地人交往情况的描述未作明确表态,因此将其赋值为中间态度值3。

日常交往人数:指在移入地经常联系的朋友的总人数,包括朋友、老乡和同事。

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均为态度测量指标,分为“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5级,分别赋值为1到5分。其中,职业满意度操作化为薪水、福利待遇、单位/公司内的升迁机会、工作自主性、对以后发展的帮助、工作量、公司劳动条件与设施、与同事的关系、与老板/上司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职业的社会声望和工作地点与住址的距离等12项具体指标。

添置房产意愿:分为“没有考虑过买房”(包括“不打算在本地买房”)、“3—5年内会考虑买房”、“已购房产”3类,分别赋值为1至3分。

(二)资料来源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一些沿海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都先后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和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数以万计的国内人才、国际精英及劳动力纷纷涌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

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成为新移民的聚居地。从相对比例来看,新移民已经占到部分城市常住人口的 $1/4$ 到 $2/3$, 比如北京的新移民占常住人口的 25% 左右, 深圳的新移民接近常住人口的 $2/3$, 上海的新移民占到常住人口的 $1/3$ 上下。从绝对数量上来说, 2006 年在城市从事白领职业的新移民约有 3000 万人(国家统计局, 2006),^① 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新社会阶层, 高达 5000 万, 新社会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异地创业或就业的, 也是作为本研究主体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 年以后每年约有 200 万左右的大专以上毕业生在异地城市就业或创业; 1978—2006 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27.5 万人(杨晓冬, 2007)。据初步估算, 1992 年以后进入城市的白领新移民大约有 1.8—2 亿人。上海, 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已成为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首选目标之一。1990 年, 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直接促进了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向沿海大中城市聚集。根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 2007 年底公布的数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 2007), 2007 年上海共有常住外来人口 479.14 万人, 占上海市 1858 万常住人口的 34.75%。毋庸置疑, 城市新移民特别是白领新移民对移入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移民中的白领阶层是实施人才资源强国战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中坚力量。因此, 研究城市新移民尤其是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 直接影响到微观层次上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和宏观意义上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与以往研究不同, 我们主要关注那些凭借人力资本或专业技术知识优势到上海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白领新移民, 不管他们是否取得了上海户籍。因此, 本研究的抽样总体是 1992 年以后移居上海、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和文职工作、18 岁以上的白领新移民。为了与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 我们还抽取了部分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主要从事技术和非技术的蓝领工作)作为参照群体。

由于上海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 许多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白领新移民并没有上海户籍, 甚至连居住证或暂住证也没有办理, 因此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白领新移民的完整抽样框。此外, 大部分白领新移民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基本上属于中间层, 这使得他们接受面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的相关数据推算。参见国家统计局, 2006。

访和配合调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鉴于此,我们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来抽取新移民的样本(赵延东、Pederson, 2007)。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新移民等。

表 1 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指标	频数(%)	指标	频数(%)
性别(N=600)		移居前地区(N=600)	
男	323(53.83)	城市	544(90.67)
女	277(46.17)	农村	56(9.33)
婚姻状况(N=600)		中共党员身份(N=600)	
未婚	383(63.67)	是	202(33.67)
已婚	217(36.33)	否	398(66.33)
户籍类型(N=598)		职业(N=600)	
本市户口	234(39.2)	私营企业主	38(6.33)
暂住证	114(19.1)	管理人员	57(9.50)
居住证	148(24.7)	专业技术人员	188(31.33)
其他	102(17.1)	普通白领	274(45.67)
		蓝领工人	43(7.17)
教育程度(N=600)		单位性质(N=600)	
初中及以下	48(8.0)	党政机关	30(5.0)
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55(9.2)	国有企业	50(8.3)
大学专科	81(13.5)	国有事业	117(19.5)
大学本科	278(46.3)	集体企事业	13(2.2)
研究生及以上	138(23.0)	个体经营	54(9.0)
		私、民营企业	164(27.3)
平均教育年限	15.56(2.98)	三资企业	140(23.3)
		其他	32(5.3)

资料收集以研究团队成员个人社会网络中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作

为起点,通过这些调查对象获得更多的潜在被访者的基本信息,然后再通过他们扩大样本范围。具体实施是运用结构性问卷、通过面访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在调查过程中,对于研究对象直接认识的潜在被访者做了二级抽样,即抽取与研究团队成员和调查员直接认识及通过成功访问的调查对象直接认识的被访者。问卷调查工作从2007年4月初开始,到5月底完成。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通过受访者推动的抽样方法获得了1150份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有885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问,拒访率为23.1%。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经过对数据的逻辑检验,又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 $1/3$ 的问卷,最后获得有效样本600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参见表1。除表1报告的基本信息外,样本的平均年龄28.62岁,平均居住时间为4.64年,平均月收入4719.64元。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因子结构

首先,我们对前述的14项社会融合指标(职业稳定程度、语言掌握程度、熟悉风俗程度、接受文化价值的程度、亲属相伴人数、身份认同程度、社会交往范围、经常交往人数、添置房产意愿、社会心理距离、拥有户籍情况、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经常交往人数”在相关矩阵中全部呈现为负相关;社会交往范围、社会心理距离与其他指标的最大相关系数均为0.262,因此“经常交往人数”与“社会交往范围”和“社会心理距离”3项指标不适合作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的结构指标(郭志刚,1999:93),故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

然后,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其余的11项社会融合指标进行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结果见碎石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F3和F4来表示(参见表2)。从表2可以看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除“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程度”(0.498)以外,都达到0.5以上。4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3.278%。K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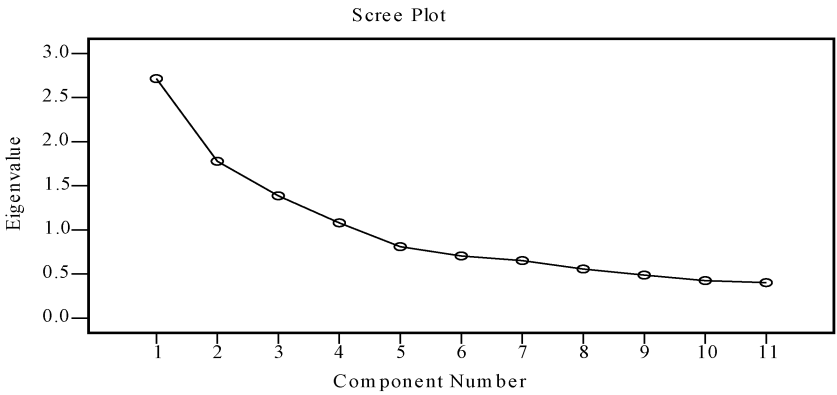


图1 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后的碎石图

检验值为 0.690,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 1235.099 ($P < 0.001$), 说明这些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和“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3项指标对 F1 的负荷值最高, 分别达到了 0.698、0.807 和 0.702, 说明此 3 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 F1。从指标所涉及的内容来看, 语言、风俗和价值观都是文化的典型内容, 因此我们将 F1 命名为“文化融合”因子(参见表 2)。

F2 主要由“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3 项指标来代表, 其负荷值分别为 0.849、0.805 和 0.629。这 3 项指标主要反映了城市新移民在心理上对迁移地社会的感受, 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心理融合”(参见表 2)。

F3 对应着 3 项指标“职业稳定程度”、“身份认同程度”和“拥有户口情况”, 其负荷值分别为 0.787、0.509 和 0.795。考虑到在题为“您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上海人’”的选项中, 选择了“有上海户口”和“在上海有稳定职业”两项的分别为 329 人和 200 人, 位居所有选项的第一和第三, 从中可见上海人身份的概念与此两项指标有较高的一致性, 故将此因子命名为“身份融合”(参见表 2)。

“亲属相伴人数”和“添置房产意愿”则主要用来说明 F4, 其因子负荷值为 0.870 和 0.638。亲属相伴人数的增加主要依赖两条途径, 一是结婚生子, 另一条是将原来的家庭成员接到移居地共同生活。对于前者而言,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 大多数人结婚会以购房作为前提。在本

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已婚者中已购房的人占 56.5%,而未婚者中已购房者仅占 12.8%。对于后者来说,将原来的家庭成员接到移入地生活,意味着城市新移民将付出较移居上海之前更高的经济代价。由于“添置房产的意愿”和“增加亲属相伴人数”直接以经济收入为基础,我们将这个因子命名为“经济融合”(参见表 2)。

表 2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因子分析结果(非标准化的 Beta 值)

自变量	新因子命名				
	F1 文化融合	F2 心理融合	F3 身份融合	F4 经济融合	共同度
职业稳定程度	-.126	-.111	.787	-.088	.655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	.698	.087	.092	.040	.505
熟悉本地风俗程度	.807	.068	.069	.033	.661
接受本地价值观程度	.702	-.059	-.027	.020	.498
亲属相伴人数	-.014	-.047	.004	.870	.758
身份认同程度	.425	.203	.509	.264	.551
添置房产意愿	.219	.169	.464	.638	.698
拥有户口情况	.162	-.014	.795	.153	.682
社会满意度	.062	.849	.068	.043	.731
职业满意度	.029	.805	.007	-.167	.677
住房满意度	.030	.629	-.150	.354	.544
特征值	1.908	1.864	1.767	1.422	
方差贡献率	17.342	16.950	16.059	12.927	
累计方差贡献率	17.342	34.292	50.351	63.278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二)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现状

社会融合程度分值则以 4 项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 1—100 之间的数值,4 项新因子也作了同样的转换,其基本分布状况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发现,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总体水平偏低(Mean=42.94, S. D=18.00),其中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的程度分别为 54.73(S. D=13.99)、48.25(S. D=23.60)、37.45(S. D=

18. 31)和 35. 32(S. D= 16. 56)。这一结果表明,城市新移民在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方面的速度较快,而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的步伐相对较慢,并且身份融合的差异性最大,心理融合的离散性最小。

表 3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

	心理融合 因子	身份融合 因子	文化融合 因子	经济融合 因子	社会融合 程度
Mean	54. 73	48. 25	37. 45	35. 32	42. 94
S. D	13. 99	23. 60	18. 31	16. 56	18. 00

(三)影响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现状的具体因素,我们将性别、婚姻状况、党员身份、教育年限、月收入的对数、居住时间、移出地和阶层地位等 8 个变量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融合及其各融合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 4)。

从表 4 第 5 列可以看到,自变量对总体社会融合程度的解释力达到了显著水平($R^2=0.380, P<0.001$)。从具体因子来看,对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大($R^2=0.432, P<0.001$),对心理融合的解释力最小($R^2=0.054, P<0.001$),对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 0.369($P<0.001$)和 0.134($P<0.001$)。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性别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1.956(P>0.05)$,说明男性新移民比女性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更低,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性别对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对具体融合因子的影响来看,性别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744(P<0.01)$ 、 $-0.033(P>0.05)$ 、 $-0.170(P>0.05)$ 和 $0.271(P>0.05)$ 。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新移民比女性新移民在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方面分别低 3.744 分、0.033 分、0.170 分和高 0.271 分,然而只有性别对经济融合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女性新移民在经济融合方面显著高于男性新移民。

婚姻状况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7.624($P<0.001$),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已婚者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于未婚者 7.624

分。从具体因子来看,婚姻状况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8.197 ($P < 0.001$)、4.530 ($P < 0.01$)、-6.599 ($P < 0.001$)和-1.164 ($P > 0.05$)。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已婚新移民比未婚新移民在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方面分别高 18.197 分、4.530 分 and 低 6.599 分、1.164 分,其中仅有婚姻状况对心理融合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已婚新移民在经济融合和身份融合方面显著高于未婚者,而在文化融合方面却显著低于未婚者(参见表 4)。

表 4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非标准化系数 Beta 值)

	经济融合因子	身份融合因子	文化融合因子	心理融合因子	社会融合程度
性别 a	-3.744 **	-.033	-.170	.271	-1.956
已婚 b	18.197 ***	4.530 **	-6.599 ***	-1.164	7.624 ***
党员 c	-1.869	10.222 ***	.410	-1.818	1.916
教育年限	-.156	2.694 ***	.133	-.184	.890 **
月收入对数	.557	.366	.019	2.770 **	2.233 *
居住时间	1.063 ***	1.818 ***	1.876 ***	.168	2.301 ***
移出地 d	1.456	2.925	5.757 *	-.990	4.100
阶层地位 e					
私营企业主	9.098 **	-26.533 ***	4.370	9.292 **	2.947
管理人员	6.383 *	-12.513 **	6.716	10.030 **	8.448 *
技术人员	6.339 *	-4.631	2.552	4.987	6.139 *
普通白领	7.321 **	-12.255 **	6.238	4.188	5.063
常数项	16.441	-2.890	19.073	30.915	-11.173
F 检验值	42.421 ***	32.894 ***	9.454 ***	4.090 ***	34.319 ***
调整后的 R2	.432	.369	.134	.054	.380
D.F.	11	11	11	11	11
N	600	600	600	600	600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 性别,以女性作为参照。
- b 已婚,以未婚者作为参照。
- c 党员,以非中共党员作为参照。
- d 移出地,以农村作为参照。
- e 阶层地位,以蓝领工人作为参照。

党员身份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1.916 ($P > 0.05$), 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 拥有党员身份的城市新移民, 其社会融合程度高于非中共党员 1.916 分, 然而这种差异并未达到显著, 显示党员身份对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 党员身份对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869 ($P > .05$)、-1.818 ($P > 0.05$)、10.222 ($P < 0.001$) 和 0.410 ($P > 0.05$)。换言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拥有党员身份的城市新移民, 在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方面分别比非中共党员低 1.869 分、1.818 分、高 10.222 分、0.410 分, 其中, 党员身份仅对身份融合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 说明拥有党员身份的城市新移民在身份融合方面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 (参见表 4)。

教育年限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890 ($P < 0.001$), 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 城市新移民的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 其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将提高 0.890 分。从具体的社会融合因子来看, 教育年限对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56 ($P > 0.05$)、-0.184 ($P > .05$)、2.694 ($P < 0.001$) 和 0.133 ($P > 0.05$)。换言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城市新移民的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 其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将分别减少 0.156 分、0.184 分、增加 2.694 分和 0.133 分; 然而只有教育年限对身份融合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 说明教育年限对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融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 (参见表 4)。

月收入对数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2.233 ($P < 0.05$), 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城市新移民的月收入对数每增加 1 个单位, 其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将提高 2.233 分, 可见月收入对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 月收入对数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557 ($P > 0.05$)、0.366 ($P > 0.05$)、0.019 ($P > 0.05$) 和 2.770 ($P < 0.01$)。换言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城市新移民的月收入对数每增加 1 个单位, 其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将分别提高 0.557 分、0.366 分、0.019 分和 2.770 分; 但是月收入对数仅对心理融合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 可见经济收入对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融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参见表 4)。

居住时间对总体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2.301 ($P < 0.001$), 说

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城市新移民的居住时间每增加1年,其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将提高2.301分,由此可以发现居住时间对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从具体因子来看,居住时间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063($P < 0.001$)、1.818($P < 0.001$)、1.876($P < 0.001$)和0.168($P > 0.05$)。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新移民的居住时间每增加1年,其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将分别增加1.063分、1.818分、1.876分和0.168分;其中居住时间仅对心理融合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居住时间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参见表4)。

移出地对总体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4.100($P > 0.05$),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来自城市的新移民比来自农村的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高4.100分,但是这一差异并未达到显著。从具体因子来看,来源地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456($P > 0.05$)、2.925($P > 0.05$)、5.757($P < 0.05$)和-0.990($P > 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城市的新移民在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方面分别比农村新移民高1.456分、2.925分、5.757分 and 低0.990分,但是移出地仅对文化融合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来自城市的新移民在文化融合方面显著高于农村新移民(参见表4)。

最后,从阶层地位来看,私营企业主对总体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2.947($P > 0.05$),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私营企业主比蓝领工人的社会融合程度高2.947分,然而这种差异并未达到显著。从具体的社会融合因子来看,私营企业主对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9.098($P < 0.01$)、4.370($P > 0.05$)、9.292($P < 0.01$)和-26.533($P < 0.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营企业主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得分方面分别比蓝领工人高9.098分、4.370分、9.292分 and 低26.533分;其中仅对文化融合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私营企业主的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显著高于蓝领工人,但前者的身份融合程度却显著低于后者。管理人员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8.448($P < 0.05$),管理人员比蓝领工人的社会融合程度高8.448分。从具体的社会融合因子来看,管理人员对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的回归系数

分别为 6.383 ($P < 0.05$)、6.716 ($P > 0.05$)、10.030 ($P < 0.01$) 和 -12.513 ($P < 0.01$)，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管理人员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方面分别比蓝领工人高 6.383 分、6.716 分、10.030 分 and 低 12.513 分，其中仅对文化融合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管理人员的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显著高于蓝领工人，而在身份融合方面却显著低于蓝领工人。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其对总体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6.139 ($P < 0.05$)，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专业技术人员比蓝领工人的社会融合程度高 6.139 分。从具体的社会融合因子来看，专业技术人员对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6.339 ($P < 0.05$)、2.552 ($P > 0.05$)、4.987 ($P > 0.05$) 和 -4.631 ($P > 0.05$)，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方面分别比蓝领工人高 6.339 分、2.552 分、4.987 和低 4.631 分，其中仅对经济融合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专业技术人员的经济融合程度显著高于蓝领工人。对普通白领而言，其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5.063 ($P > 0.05$)，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普通白领比蓝领工人的社会融合程度高 5.063 分，然而这种差异并未达到显著，说明普通白领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与农民工没有显著的差异。从具体的社会融合因子来看，普通白领对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7.321 ($P < 0.01$)、6.238 ($P > 0.05$)、4.188 ($P > 0.05$) 和 -12.255 ($P < 0.01$)，说明普通白领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方面分别比蓝领工人高 7.321 分、6.238 分、4.188 分 and 低 12.255 分，其中对经济融合和身份融合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普通白领在经济融合程度上显著高于蓝领工人，但在身份融合程度上却明显低于蓝领工人(参见表 4)。

四、结论与讨论

从第三节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初步结论。

(一)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由心理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等 4 个因子构成

统计分析结果揭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在结构上由 4 个因子

组成：心理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如前所述，关于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从基本取向上可以区分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李明欢，2000），前者强调本地文化的主导优势，而后者更具包容性。“同化论”认为，移民一定要学习、适应、接受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抛弃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才能实现同化和融合。而“多元论”则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 et al, 1980；周敏，1995）。上海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成为移民城市，其承载亚文化的能力不断提高。正如城市社会学家费舍的亚文化理论所说：“城市中较高的偏差行为和无组织行为的发生率并不是由诸如人际的疏离、匿名性和非个性化的交往，而是由于一定数量的能够承载一个可自行生长发育的亚文化人口的存在，这个一定的人口称为‘临界多数’”（Fischer, 1975: 1320）。“人口规模大的地点比起人口规模小的地点发展出越来越多的特殊亚文化”，因为“人口规模大的地方吸引了从一个范围更广的地方来的人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通过经济、空间、机构和文化特殊性衍生了更大的不同，因此大城市比起小城镇来说可能拥有更多的围绕着种族、职业、休闲和其清晰的特征而组织起来的亚文化”（Fischer, 1995: 545）。正是因为当代大城市对亚文化有着巨大的承载力，使得国内城市新移民面临的文化冲突远小于国际移民，所以，对其社会融合的研究维度不能像国际移民研究一样，将其局限于文化融合问题。在我们的结构分析中还考虑到了“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3个因子，其中“经济融合”因子回应了经济学家们对移民经济融合问题的关注（赵延东、王奋宇，2002）；同时，这一结构也与田凯（1995）提出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一致，其中身份融合的实际内容与其所提出的社会层面相对应。有意义的是，本研究将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做出区分，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将这两个方面的融合混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局限。简言之，仅仅从“同化论”的视角来理解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可能是不恰当的，“融合与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朱力，2002）。对城市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视角，不必局限于对本地文化的掌握，或许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分析更适合结构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将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整合为总体社会融合

的四种结构维度。

(二)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相对而言,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较高,而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程度则较低

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反映出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一样,与当地居民相比,在心理、文化、身份和经济等层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社会互动与社会适应才能缩小或缓和。造成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无论在新移民与本地居民彼此交往的意愿还是在实际交往的行为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本次调查中,在“一起工作”、“聊天”、“做邻居”、“做亲密朋友”、“做亲戚或通婚”和“共同参与社区管理”的主观意愿方面,新移民和本地居民选择“愿意”的比例分别为42.2%对52.5%、47.2%对57.7%、43.7%对44.7%、42.2%对41.0%、31%对27.5%、41.2%对29.5%。新移民与本地人交往的意愿总体上低于本地居民与新移民交往的意愿。这种明显的差距影响了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交往,使得他们有可能从主观上抗拒与本地人的日常交往。与此相一致,新移民经常接触的人、经常交往的朋友和同事中的非本地人分别高达40.7%、59.2%和39.7%。社会交往网络的非本地化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融合的进程。这也是在最初的因子分析中社会参与指标没有通过检验而被剔除的一个原因。第二,在实际生活中,新移民均有不同程度地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经历。回答“偶尔”和“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比例分别为9.2%和51.6%,这种情况发生在商场、公交车、工作单位、政府部门、医院、学校、服务娱乐场所、居住小区等场景下以及找工作的过程中。在一个社会或地区,如果存在着对某些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必然阻碍这个社会或地区实现各类社会成员和谐相处的目标。第三,移居时间较短,是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的一个原因。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平均移居上海的时间为4.64年(标准差为3.34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论对于本地语言的学习与使用、本地风俗习惯的掌握、对本地价值观的接受,还是在形成身份认同、获得稳定的职业地位和提升社会地位,以及作为定居标志的商品房的购置、作为最根本的社会融合的与本地人通婚,形成社会网络的本地化,都不可能在此如此短的移居时间内取得明显的进展。第四,现行的户籍准入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对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产生

了负面影响。虽然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松动,与户籍制度直接挂钩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待遇逐渐减少,甚至在部分中小城市已经在进行以“居民身份”取代“农业与非农业户籍身份”的二元区隔,但是在多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身份与社会福利待遇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密。比如,在上海的户籍管理政策中,尚未取得上海户籍和居住证的居民的子女,没有参加上海中考和高考的权利;同样,取得上海户籍和居住证的新移民与持暂住证的居民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待遇也相差甚远。

为何从社会融合不同维度的发展情况来看,城市新移民在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方面的程度高于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的程度呢?与朱力(2002)的理论分析不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程度呈现出梯次降低的走势,我们认为,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相对较高,反映了移居地“城市魅力”的效应。第一,正如王赓武(2002)所言,财富和经济增长的中心,必然也会成为移民的聚集中心。如果按照“推拉理论”(Bouge, 1959)来解释,正是上海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规范的制度环境以及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较多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成为吸引众多国内外新移民到上海定居的重要原因。本研究的心理融合是按照受访者对“职业、住房和社会总体状况”的主观评价来测量的。我们知道,对某些指标的主观评价得分,既与受访者相应的客观状况和实际行为直接相关,也与新移民流动前的状况和移居后与当地居民的横向比较密切相关。心理融合的程度相对较高,正是新移民对自己目前的职业、住房和社会总体状况比较满意的直接反映。积极主动的自愿移民动机(以工作/就业/创业等经济原因移居上海的受访者占75.7%),相对满意的收入状况,^①相对较轻的年龄(平均28.6周岁)和较高的教育程度(平均教育年限15年,相当于大学专科以上),使得新移民所具备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强于其他群体,有可能使得这个特殊的移民群体产生较高的心理认同和身份认同。

第二,较高的身份认同与新移民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对自己身份及户籍地位的现实评价相关。本次调查显示,75.2%受访者在移居上海以后没有发生过职业流动,而来上海之前的相应比例是65.2%,这个

^① 样本的平均月收入为4719.64元,高于上海职工平均月收入的2892元。参见高路,2008。

数字说明新移民移居上海以后的职业是相当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是与对目前职业的较高满意度密切相关的。在狭义的身份认同方面,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新上海人”和“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的比例分别为23.8%和21%。取得上海户籍和居住证的比例分别为39.2%和19.1%。尽管目前取得上海户口的条件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而不断提高门槛,然而,上海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开始推行居住证和暂住证政策,使得那些没有取得户籍的新移民也享受到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成果。因此,生活和工作在上海而被政策排斥的总体感觉会有所降低,从而能促进其身份融合的增加,这一点正好支持王春光(1999)的观点,即社会融合“关键取决于一体化制度建设与多样性制度建设之间的均衡状况,同时这些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一体化和多样性的重新建构,因此,在移民融入上不存在单一的最佳模式,而更具多样性”。

第三,移居地方言的式微和本地风俗习惯及价值观念的变迁是造成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程度的直接原因。在我们的调查中,在工作场所、社交场合和家中讲普通话的比例分别高达93.7%,94.0和69.8%,在上述三个场合讲上海话的比例则分别仅占2.8%、2.8%和2%。这可能与政府为了提高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在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政策有关。本地出生的上海年轻人能讲地道上海方言的越来越少,就是方言式微的真实写照。作为国内新移民,他们可能不会像国际移民一样,对于文化差异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对城市文化的不适应也可能导致他们直接将“城市性人格”与本地文化等同起来而更倾向于淡漠与本地文化的融合。新移民不用学习上海话、上海风俗和待人处事的方式,亦不必接受本地文化就可以较好地生存。另一方面,上海文化本身就具有“海纳百川”的较强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因此,新移民有可能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在移居地(上海)很好地生活。

第四,新移民的购房需求与实际购买率之间的差距直接影响了其经济融合程度。在本项调查中,计划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新移民占51.6%。而在何谓“上海人”的主观认定中,有28.5%的被访者认为“应该在上海有房子”,但目前已购商品房的仅占29%。在目前没有购房的新移民中,有57%计划3—5年内在上海购置商品房。可见新移民的购房需求与实际购买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与上

海近几年来不断走高的商品房价格直接相关。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新移民较低的货币支付能力与较高的商品房价格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虽然上海等大城市近几年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推出了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政策,但是目前这两类保障性住房的购买者也仅限于户籍人口,并不能惠及那些还没有取得上海户籍的新移民(占本项调查中 60.8% 的新移民没有取得上海户籍)。既不能通过市场的渠道,也不能通过保障的渠道获得适宜居住的住房,自然影响到已婚者将配偶和子女、未婚者将父母和其他近亲属接到移居地,很显然也不能将移居地真正当作自己的“家”。

(三)影响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因素分析

本研究发现,社会人口变量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一,不同性别的新移民的经济融合程度差异明显,表现为女性新移民的经济融合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女性有更强烈的团聚和陪伴的需要,一旦定居,她们会更加积极地将亲属接到身边。出于安定生活的考虑,女性也可能比男性更倾向于将收入投入到购置房产上。此外,同男性相比,女性通过婚姻的方式来直接提高经济融合程度的条件也更加便利。

第二,已婚新移民的经济融合程度和身份融合程度明显高于未婚者,而前者的文化融合程度却显著低于后者。本次调查显示,已婚的城市新移民比未婚者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前者的平均月收入为 5730.85 元,后者为 4031.07 元),无论在购置房产还是在实现亲属团聚的目标方面,均比未婚者有更强的经济支付能力。同时,已婚的新移民比未婚者更多地考虑职业的稳定性。此外,已婚新移民的闲暇生活的重心也可能从家庭外部转向核心家庭内部,降低了与本地居民交往的可能性,从而使学习移居地语言、了解移居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机会相应减少。

第三,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融合程度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显然,拥有党员身份的新移民更容易找到体制内的职业,而按照现行的上海户籍政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在为雇佣员工申请本地户口时比体制外单位更有优势。拥有党员身份的城市新移民更可能在体制内单位发挥其专长,更可能受到现行体制的保护。因此,无论是在实际取得的本地户籍身份还是在

主观身份认同方面,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第四,教育获得对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融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王芮、梁晓,2003;周敏、林闽钢,2004)。我们认为这与现行的户籍准入制度对学历的较高要求直接相关。《2007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评分办法》明确规定,最高学历为本科者可获得21分,硕士24分,博士27分,其他学历无分(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网,2007)。因此,教育年限越高的人更可能取得移入地的户籍并找到稳定的工作,由此受到的社会排斥也较少。

第五,经济收入对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融合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构成心理融合因子的3个因素——住房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社会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移居以后的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联系。增加经济收入、提升社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的质量是多数新移民移居上海的主要原因,而经济收入是满足其他需要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当他们的这些需要在移居地社会获得基本满足后,自然就会对移居地的总体状况产生较高的评价。

第六,居住时间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根据切茨维克对美国犹太移民的研究经验,移民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积累相关的劳动经验、语言能力等人力资本,从而更有可能获得经济成功(Chriswick,1984),提高经济融合、身份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会相应地增加;同时,伴随居住时间而增加的人力资本(如工作经验、掌握当地语言的能力等等)也会达到与教育年限相同的作用,即职业更加稳定、更认同本地人身份。至于居住时间对于心理融合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是新移民社会评价的参考群体发生了变化。在移居初期,他们评价的参照对象是移居前的地区和同辈群体;而随着定居时间的延长,其评价的参照群体可能转向本地居民。

第七,来自城市的新移民的文化融合程度显著高于来自农村者。来自城市地区的新移民,对于作为城市文化共同特征的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比较熟悉。而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他们不但面临着巨大的城乡文化差异,更可能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带着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而受到迁入地居民的排斥;为了维持自尊,他们很可能对移居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采取拒斥的态度。这个结果也与其他研究的结论一致,即“在移民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同化和相互之间的融合,而是相互之间的分化与隔离”(刘玉照,2004)。

最后,从阶层地位上来看,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文员在经济融合上均显著高于蓝领工人。同蓝领工人相比,由于其他阶层的成员拥有较丰富的人力资本,更可能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因此在移入地定居和长期发展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而多数蓝领工人则像候鸟一样不断地在移入地与移出地之间流动,其他阶层的人更可能将其经济收入投入到住房条件改善和子女教育等方面,而蓝领工人则更多地将其经济收入返入迁出地,如农民工倾向于将大部分工资收入寄回家乡(李强,2004:184)。令人意外的一个发现是,除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他阶层的新移民对身份融合程度的评价明显地低于蓝领工人。尤其是对私营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来说,由于职业需要,他们与本地人交往的机会比专业技术人员和蓝领工人都多,所以他们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外地人身份,因此他们更可能将自己认同为外地人。而专业技术人员和蓝领工人的社会交往范围由于受到其职业性质的影响,更可能囿于狭窄的圈子内。在心理融合上,只有私营企业主和管理人员的评价得分显著高于蓝领工人,而技术人员和普通白领与蓝领工人没有显著的差异。结合经济收入的分析来看,可能由于私营企业主和管理人员相对更高的经济收入使其对职业、居住状况和移入地社会都有更高的满意度,而其他阶层的新移民伴随经济增长带来的心理满足则为生活成本迅速上升所抵消,因此相对于私营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来说,其心理融合程度相对较低。

总之,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因子由心理、文化、身份和经济4个因子构成,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从具体因子来看,体现出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程度依次降低的倾向。社会融合的总程度偏低,反映出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一样,需要跨越某些界限才能实现与移入地社会的真正融合;相对较高的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反映了作为移居地的上海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状况,则反映出“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而带来的障碍。因此,要实现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高度融合,需要新移民、本地居民和政府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丁宪浩,2006.《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财经科学》第10期。

- 风笑天, 2004, 《“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高路, 2008, 《2892元, 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2007年涨了17%》,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content-7862938.htm>)。
- 国家统计局, 2006, 《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郭志刚, 1999,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频道(<http://www.liuxue.edu.cn>, 2007, 03, 06)。
- 李明欢, 2000, 《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李强, 1995, 《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 2002,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2002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4,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2006, 《国际移徙与发展》, (<http://www.un.org/chinese/focus/migration/103.htm>)。
- 刘玉照, 2004, 《“移民化”及其反动——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 《探索与争鸣》第7期。
- 吕青, 2005, 《新市民的社会融入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江南论坛》第2期。
- 马西恒, 2001, 《敦睦他者: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形态的探索性研究——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http://www.sdx.sh.cn/depportal/department/city/view>)。
- 麦格(Mager, Martin N.), 2007, 《族群社会学》, 祖丽亚提·司马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任远、邬民乐, 2006,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人口研究》第3期。
- 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网, 2007, 《2007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评分办法》(http://www.firstjob.com.cn/common_newsDetail.jsp?Newsid=1182998619156)。
-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 2007, 《2007年底上海常住人口预计达1845万人》, 新华报业网(<http://news.xhby.net/system/2007/12/06/010163737.shtml>)。
- 田凯, 1995,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 王春光, 1999, 《温州人在巴黎: 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王康武, 2002, 《移民及其故人》, 《王康武选集》,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芮、梁晓, 2003, 《温哥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世界民族》第4期。
- 新华网, 2008, 《2892元, 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2007年涨了17%》, 3月26日。
- 杨黎源, 2006, 《外来人群的社会融合探讨——基于对宁波社会调查的分析》, 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shhd/P020061120233280629394.pdf>)。
- 杨晓冬, 2007, 《海外引才步伐加快重在领军创业》,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9月24日。
- 张国胜, 2007,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 张继焦, 2004, 《差序格局: 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 《民族研究》第6期。
- 赵定东、许洪波, 2004, 《关系的魅力与移民的社会适应: 中哈移民的一个考察》, 《市场与人口分析》第4期。
- 赵延东、Jon Pederson, 2007, 《受访者推动抽样: 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 《社会》第2期。
- 赵延东、王奋宇, 2002, 《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 《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周敏, 1995,《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敏、林闽钢, 2004,《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朱力, 2002,《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第6期。
- Bogardus, Emory S. 1925, "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9.
- Bogue, D. J. 1959, "Internal Migration." in P. M. Hauser & O. D. Duncan (eds.),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riswick, Barry R. 1984 "The Labor Market Status of American Jew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in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1985. 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 C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cher, C. 1975, "Toward a Subculture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May).
- 1995 "The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 Twentieth-Yea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Huh, W. M. & K. C. Kim 1984 "Adhesive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Korean Immigrants in the U. 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of Minority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8(2).
- Mitchell A. & R. Shillington 2002, "Poverty, In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http://www.Laidlawfdn.org/page_1069.cfm December 2002
- Park, Robert E. 1974,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Romantic Tempe*. Robert E. Park & Ernest (eds.).
- Portes Alejandro, Robert Nash Parker & Josea Cobas 1980, "Assimilation or Consciousness: Perceptions of U. S. Society Among Recent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59)1.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张文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雷开春)

责任编辑: 张宛丽

theory. It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paradigm change brought by systems theory, highlighting its anti-humanistic and non-normative orientation in theoretical building. Through discussions on the new vision offered by Luhmann to understand society and individual, and substantive issues such as social movement and democrac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Luhmann's strong insistence on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system rationality, and also offers a tentative critique of his posi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although this theory is still debatable as to its validity, it does offer a new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vision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Christianity: Prob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religious economy model to China *Lu Yunfeng* 81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narrow empirical focus on western religions has mad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ecoming the sociology of Christianity. As the new paradigm in sociology of religion, the religious economy model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exclusive religions in western societies but ignores non-exclusive religions especially those in East Asi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nalyz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religious economy model to Chinese religions. In doing so, we can not only broaden the scope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Marriage Age,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and the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Childre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Evidence from China population census in 2000 *Guo Zhigang & Li Rui* 98

Abstract: Data from China 2000 census shows that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percentage has increased faster than *han* people. In addition to higher fertility, the choice of ethnic status by children from inter-ethnic marriage families may be another possible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change. This study conducts data-mining to the sample data from China population census in 2000, and depicts the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mean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for inter-ethnic marriage coupl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children from inter-ethnic marriage families are more inclined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minority ethnic. Finally, we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such preference to minority status by the children from inter-ethnic marriage families on the growth of minority population.

The Urban New Immigrants' Social Inclusion: Intern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Zhang Wenhong & Lei Kaichun* 117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urban new immigrants in Shanghai in 2007, this paper utilize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ir social i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the

urban new immigrants' include 4 factors, namely, cultural i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identity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 (2)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ir social inclusion is still low; (3) the degree of these factors present decreasing trend from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to identity inclusion, cultur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 These results reflect that: (1) the domestic immigrant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call for some limited leap to achieve integrating into the new land in deed; (2) as an immigrant area, Shanghai provides larger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new comers to advance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which explains the status of the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and identity inclusion; (3) the pluralism of urban culture may promote the cultur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 of the newer, while the increasing cost of city life may have an opposite effect. Therefore, the high-level integration of the newer and the native depends on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newer, the native resident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Hu Rong* 142

Abstract: Based up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Xiamen in 2005,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items measur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onsist of resistance factor, interest expression factors and election participation factor.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 that factors of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traditional participation manner, such as personal contact, remains quite important, other new ways of interest articulation emerge. Therefo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ways of urban reside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becoming more plural.

Equity in Health Care Financing in Rural Area in China: Cas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Financing System in eight rural counties ... *Wang Jing* 160

Abstract: The Health Care Financing System will highly affect the accessibility to health car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paper applies Kakwani index and PII index to analyze the vertical equity and horizontal equity of the three main resources in rural Health Care Financing System.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guarantees the horizontal equity but sacrifices vertical equity,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embodies low vertical equity, however, seriou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equity still exists in the self-responsibility payment system.

The Affec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 the Research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A case study of kinship term
 *Zhao Manhai* 186